

# 试析近代侨批跨国网络的历史变迁

焦建华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近代侨批跨国网络萌发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水客行业,20世纪20年代之前逐渐形成,其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因二战时期厦门、汕头以及东南亚地区先后被占领,侨汇跨国网络遭受重挫。二战结束后,因侨汇众多和金融投机盛行,侨批跨国网络进入鼎盛期。然而,因侨民逐渐认同于当地,当地政府限制或禁止侨汇,以及新中国政策变化,侨批跨国网络趋于消逝。

[关键词]侨批跨国网络;历史变迁

DOI:10.13469/j.cnki.zgshjjsyj.2015.03.010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5)03-0087-09

近代侨批<sup>①</sup>网络是在侨批寄递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跨国商业网络,主要以闽粤和东南亚各地批信局为基础,包括杂货店、进出口商行等传统商业组织和近代邮局与银行,经营侨批的收集、寄递、分送、回批收寄等业务。近代侨批跨国网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展而成,覆盖了东南亚广大华侨居住区和中国闽、粤(包括海南)两省、上海及广西部分地区。迄今为止,学界尚未系统探讨侨批网络的历史变迁,本文将就此全面深入探讨,以期完整揭示近代侨批网络及侨批业的发展规律,以期丰富华侨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 一、侨批网络萌发时期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因侨汇数额与频率有限,侨批业最早经营方法为个人零散经营,即水客形式,这是侨批网络的萌发时期。所谓水客,又称“走水”,潮汕称“溜粗水”,漳厦称“客头”或南洋客,原是城市与乡村间往来行商,后来扩展到海外,<sup>②</sup>泛指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替海外移民携带钱物给在国内家眷或亲戚以谋利的人。另外,部分水客兼为东南亚地区招工或带人出国,又被称为

“客头”,而且水客和客头后来越来越不可分。<sup>③</sup>

水客始于何时无从查考,18世纪末已有水客不少记载,<sup>④</sup>19世纪记载的更多,往来于东南亚的水客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存在。<sup>⑤</sup>随着移民日趋增多,捎带钱物的行为逐渐演化成一种收寄信款的专门职业。19世纪中期,水客业务已很繁荣,华侨汇款“多托水客,或相识之归侨”,往返时间较长,水客一般按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sup>⑥</sup>水客人数也比较多,汕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约有800多人,香港约200多人。<sup>⑦</sup>19世纪中期闽南几县就达一千多人;<sup>⑧</sup>厦门20世纪初期约有1200人;<sup>⑨</sup>从1848年到1910年,仅福建永春县就有30人;<sup>⑩</sup>南洋等地水客也为数不少,仅新加坡一地就有潮州籍水客200多人。<sup>⑪</sup>

水客是批信局出现之前的主要经营形式,是侨批网络的萌发期。

首先,水客将中国闽粤侨乡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联系内容更丰富,更为常态化。随着西方国家开发东南亚以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由于两地之间并没有邮政或银行的联系,水客作为海外华商中的行商,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发挥了闽粤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JL029)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15-04-07

海外地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沟通了闽粤乡村、城市与东南亚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充当了沟通国内外信息、互递亲友馈赠的使者,传递国内外信息和钱物,深受华侨和侨眷欢迎。水客充任了闽粤侨乡与东南亚侨民之间的资金通道和信息媒介,加深了闽粤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地域、信息和资金的联系,这正是后来侨批网络的主要职能。当然,这种联系更多是通过流动的个人来实现,更多是地域上网络,而且联系也较为分散,运转频率也较低。

其次,水客时期形成了侨批网络一些主要制度与职能。如信汇制度、侨批“帮号”制度、按址登门送款和代写回批等,<sup>12</sup>正如饶宗颐所言“现时批业之登门收寄按址送交,以及回批交还等手续,无一不循水客之旧惯”,<sup>13</sup>这些制度在侨批网络形成与运转中不可或缺。

因此,水客奠定了侨批网络构建的基本制度与运作基础,对近代侨批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sup>14</sup>

## 二、侨批网络形成时期

###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

19世纪中后期,批信局相继建立,分布逐渐广泛,或设立分支机构,或与他局联号(代理),在国内外分联号之间投递侨汇与批信,或由各地“批脚”投递,有时批脚也没有固定批信局,往往替数家批信局投递。除少数批信局能在国内外设立独立的分号或联号外,大部分都是与其他局号建立代理关系,共同完成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回批寄递等事宜。因此,近代侨批网络盘根错节、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四通八达,或自成网络,或受托中转,甚至可以只替批信局投递,联网灵活方便,既有固定联网,也有临时建网,较之早期的邮政网络有过之而无不及。<sup>15</sup>此外,批信局以自身业务关系为基础,也充分利用服务日趋完善的现代金融与邮政服务机构,从而在20世纪20年代前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网络体系,其最显著表现就是广泛分布的批信局。

#### (一) 闽南批信局<sup>16</sup>

福建最早的批信局据说为1871年创办于

安海的郑顺荣批馆,<sup>17</sup>厦门较早的是黄日兴批信局,<sup>18</sup>规模最大的天一批信局开办也较早,由漳州人郭有品1880年设于厦门。闽南批信局以厦门最多,据业者估计,80年代,厦门有批信局8家,<sup>19</sup>及至1901年厦门批信局已达30家。20世纪初,厦门已有批信局70多家。<sup>20</sup>当时三家以中国为据点的批信局中,有两家,即天一和悦仁总号在厦门。天一批信局规模最大,该局先后在马尼拉、西贡、檳城、新加坡、棉兰、巴达维亚、万隆、三宝垄、仰光等地设置分行或代理店,而在福建境内泉州、漳州、同安、安溪、安海、金门、惠安等地设立分局。<sup>21</sup>另外,泉州、漳州、安溪、金门等地也设有批信局,主要将侨批直接送达收款人,不过无法确知局号数目。

#### (二) 潮汕批信局<sup>22</sup>

1829年,汕头有余庄批信局和澄海致成批信局分别设立;1856年德利批信局设立;1858年常丰泰设立。<sup>23</sup>1870年,汕头又设立了经营泰国侨汇的致华丰、永华丰和永和丰等批信局,1882年时已有12家批信局。<sup>24</sup>其后,潮汕地区批信局日益增多。20世纪初,汕头比较大的批信局有56家,较小的批信局还有十余家。其中,再和成总号在汕头,其他批信局多为代理店,受东南亚批信局委托,较大的代理店一般会在澄海、海揭、潮阳、揭阳、惠来、普宁、饶平、大浦、丰顺和梅州设有分号。<sup>25</sup>

#### (三) 香港中转局

香港为中国南部汇兑中心,东南亚批信局与厦门、汕头等地有业务往来时,经过香港中转获利甚大,因而香港的客栈、银号和南北行等皆从事汇兑业务。据1914年日本台湾银行调查,香港经营侨汇的批信局或钱庄等中间店共有20余家,其中代理汕头的共11家,而代理厦门的9家。这些中间店通常每年收取50-100元不等的代理佣金,或按照办理汇款的金额,抽取2%作为报酬。<sup>26</sup>

#### (四) 东南亚批信局

东南亚批信局非常多,而且多以东南亚为总号据点,规模大的会在香港、琼州、汕头和厦门等地设分行,其他则于同处设置代理店以保持两地间的联系。当然,设代理店为多数,占90%以上。<sup>27</sup>根据顾客地域不同,东南亚批信局

可分为潮州帮、广东帮、琼州帮和福建帮。新加坡是南洋各地中枢地,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等也以它为中心,批信局数量极多。20世纪初,根据日资台湾银行统计,大小约有200多家,潮汕帮较大的有15家,较小的40余家;福建帮较大的约36家,较小的50余家;广东帮较大的有17家,其他惠州、高州和雷州等约50余家;檳城较大批信局有6家,其他有70-80家,数目仅次于新加坡。<sup>②</sup>

至于东南亚其他地区,潮汕帮主要分布在泰国,1911年时泰国批信局从约20家增加到58家,分属潮汕、海南和客家;<sup>③</sup>1914年有五十多家,其中80%是潮汕帮;另外安南有10余家。福建帮主要分布在菲律宾和印尼,由于菲律宾华侨主要是福建人,因此菲律宾批信局基本上都是福建帮(7家)。此外,印尼有20家,主要分布在巴达维亚(11)、万隆(1)、日惹(1)、梭罗(3)、三宝垄(2)和井里汶(2)。广东帮批信局分布在巴达维亚(1)、日惹(1)、三宝垄(1);嘉应州帮主要分布在巴达维亚(8)、三宝垄(5)、井里汶(1);安南批信局有30多家,主要为琼州帮和潮汕帮控制;仰光有天一和瑞仁2家。<sup>④</sup>

总体而言,批信局数量已大大增加,初具规模,分布范围也大大扩展,已经遍及闽粤主要城市以及东南亚主要地区和城市,以批信局为基础的侨批网络已初步形成。

### 三、侨批网络发展时期

#### (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sup>⑤</sup>)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前期,批信局进入快速发展期,侨批网络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批信局数目快速增加,分布地域更为广阔

闽南地区 根据福建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正式登记注册的批信局总数为:1931-1932年分别为255、228家,1933、1934年总数不明,但从厦门的数量可知其不少;1935-1938年分别为166、142、137和120家,其中厦门1931-1938年分别为其他196、177、174、135、140、116、114和26家(鼓浪屿有68家)。<sup>⑥</sup>根据国民政府规

定,批信局以1935年总号数为限,此后只减不增。1938年5月厦门为日本侵占,厦门批信局外迁,岛内批信局数目急剧下降,而鼓浪屿、晋江等地迅速增加。另外,没有在邮局登记或借用他局牌照营业的批信局为数也不少。除厦门外,晋江、东山、云霄、诏安、永春、洛阳、涵江、漳浦、安溪、金门等地也有不少批信局,较前一时期分布更密集,区域更广阔。

潮汕地区 据《潮帮批信局》及“续集”二书所载大体统计,1920-1938年汕头设立的批信局就有74家,投递局18家,期间实际营业的批信局先后达100家,投递局37家,<sup>⑦</sup>另据日本三十年代的调查,汕头有66处,广东省内其他各地有27处,合计93处。<sup>⑧</sup>1935年在汕头邮政局领有执照的批信局计110家,其设立海内外的“分号”共计790家。<sup>⑨</sup>1937年,仅汕头市注册批信局有66家(广东其他地方27家,共计93家),<sup>⑩</sup>翌年增至85家。

东南亚地区 20世纪20年代后,批信局更为兴盛,数量大幅增加。1930年,马来亚、婆罗洲、缅甸共有批信局210家,印尼60家,泰国80家,法属印支区50家,菲律宾15家。<sup>⑪</sup>1940年,新加坡、巴达维亚、曼谷、马尼拉和西贡等地批信局共计419家。<sup>⑫</sup>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批信局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分布地域更为广阔和稠密,即使一些偏远地区的华侨也会相应存在侨批服务机构。

#### (二) 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趋势

由于商业网络本身是一种非制度化、非正式的商业联系,其运行的外在宏观环境,如国家、法律等又是制度化组织或规定,商业网络必然会与这些现实世界的正式制度发生联系。滨下武志曾指出,过于“制度化”的社会,需要思考如何与这种现实的、“非制度化”的网络对接。<sup>⑬</sup>同样,商业网络也要考虑与制度化世界的对接,发挥其影响,以充分维护自身利益。因此,网络演变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目标引导驱动,这将有助于提高网络的凝聚力与影响力。“识别网络演变的目标引导特征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该网络中是否存在一个管理实体,它作为经纪人(broker)计划和协调着整个网络的活动。

这一管理实体可以是该网络内部的某个成员,或专门扮演协调角色的某个独立的行动者”。<sup>④</sup>“这一实体的任务就是帮助构建网络,协调和管理它的活动,支持网络成员企业和网络层次的目标,并且提供一个集中的场所来开展对这个网络来说关键的活动”。<sup>⑤</sup>侨批网络的发展即如此,在非正式网络的基础上,出现了制度化的组织,即侨批业公会。

侨批网络制度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闽粤和东南亚各地先后出现侨批业的民间协调机构——侨批业公会(名称各异,如汇兑公会、银信业同业公会等)。由于侨批公会的重要性,几乎每个侨批业较发达地区都建立了自己的侨批业公会。1926年,广东汕头将清光绪中期设立的南侨批业公所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1931年又改为汕头市侨批同业公会。<sup>⑥</sup>福建有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晋江银信业同业公会等。东南亚各地也有侨批业公会,泰国有暹罗华侨银信局公所(1930年),新加坡有闽侨汇兑公会、潮侨汇兑公会和琼侨汇兑公会,马来亚有檳城银信业公会、雪兰莪中华汇业公会,马六甲中华汇业公会等。“由于清晰的边界、集中的领导和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结,使得这类网络能够在政治及其他事务中以一个行动者的面目出现”。<sup>⑦</sup>正是由于侨批业公会的建立,侨批网络看起来像一个正式组织。侨批业公会在维护侨批网络和业者利益、协调网络内部(国内批信局、国内与国外批信局)关系、负责与政府交涉协调等事务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侨批网络提供了组织支持,并为网络的稳定和完美提供了制度保证。

#### 四、侨批网络挫折时期(1938—1945)

随着日军先后攻占厦门、汕头等关键网络节点,侨批网络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南洋各地相继陷于日军之手,菲律宾、印尼、越南、缅甸、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均被日军占领控制,日军大肆屠杀华侨,劫掠华侨资财,华侨经济遭受重创,华侨已丧失或严重削弱汇款能力。香港沦陷使侨汇网络丧失另一重要中转站,东南亚被占领则丧失了侨汇源泉。因此,国内日军占领区侨批业几

乎陷于停顿,绝大多数批信局停业,闽南侨批网络几乎完全中断,潮汕遭受重创。

##### (一) 闽南侨批网络

1938年5月,作为闽南侨批网络的最重要节点之一的厦门被日军攻占,批信局受到很大冲击。厦门有7家批信局停业,67家迁往鼓浪屿,17家移往其他地方继续营业,12家住址不明无从调查,仅有1家留在厦门继续营业,<sup>⑧</sup>闽南侨汇中心逐渐由厦门移入泉州。不过,由于抗战之故,华侨爱国热情高涨,踊跃汇款回国支持抗战。因此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建收到的侨汇数额仍然巨大,侨批网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运转。不过,福建批信局数目已趋于下降,1938—1941年批信局总号数目分别为130、122、122和120家。<sup>⑨</sup>而且,1940年后批信局侨汇业务急剧下降。国内物价和外汇市场上涨,官价汇率与黑市差价甚小,华侨把通过银行汇款作为支持抗战的一种表现,绝大部分侨汇都经过国家银行汇回,<sup>⑩</sup>而不通过以批信局为基础的侨批网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建批信局总号显著下降,1942—1945年分别为115、99和97家,<sup>⑪</sup>侨批业务也急剧萎缩。1942年底,晋江邮局称“各批信局截至目下均未收到美属菲律宾、英属南洋群岛、马来联邦、北婆罗洲及荷属印度等地陷落后之批信,足证各该处之侨胞信款已无法交由当地批信局汇寄,至泰国及法属安南等地侨胞寄来之批信,系由各该处批信局收寄,汇款系用密码或秘密方法通知其在东兴或鼓浪屿分设之批信局转知收款人并各地批信局,款项方面则由各该处批信局私运当地货物到东兴售卖,将款转汇各处,或以当地钱币带至东兴兑换法币,由行局分汇各地批信局或收银人收领。”<sup>⑫</sup>1945年间,福建曾有少量汇款,由英、美、澳洲和印度孟买等地的华侨汇款回闽,和由中行国外部转汇,小部分由重庆、贵州两地汇入,另外东兴侨汇秘密通道可能有小额福建侨汇。<sup>⑬</sup>总体而言,1943—1945年,福建侨汇基本断绝,侨汇基本停止,侨批网络彻底中断。

##### (二) 潮汕国统区侨批网络<sup>⑭</sup>

潮汕地区被日军攻占时间稍晚,而且潮汕

侨汇的主要来源地——泰国——并未被日军攻占,因此潮汕地区侨汇业情况较福建好。1938年,揭阳原来10多家批信局继续经营,业务还不少。<sup>①</sup>1939年6月,汕头被占领,随后潮汕其他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日军在沦陷区横行肆虐,民众遭受百般苦难,潮汕侨批业日益艰难。侨批网络也受沉重打击,数量大幅减少,甚至短暂中断。汕头市批信局有的解散,有的搬至内地国统区,其中有的立分号于兴宁、梅县等处,以维持对香港汇路的联系。另外,为改善邮运,汕头局还派邮务视察员陈世安与日本占领当局商妥,自1939年10月26日起,每日由汕头局派差一名乘军车来回押送邮件一次。<sup>②</sup>因此,侨批数量锐减,1939年7月至12月,批信及回批共计597090封,<sup>③</sup>平均每月为5万封,仅比战前的10%稍多,不过大体还能维持经营。1941年,汕头市批信局仅存38家,且多数裁员减薪,经营业务衰落。潮汕各县的侨批局,也多数缩小业务或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潮汕侨批网络遭受重创。汕头原来有执照的批信局一共86家,1943年,从汕头和潮安迁至后方梅县、饶平、惠来、大埔等地继续经营或后方当地开设的批信局为23家,还留在汕头市的批信局尚有60余家,但经日本当局许可办理侨汇的批信局只有37家(实为34家)。<sup>④</sup>由于香港和南洋沦陷后侨汇完全中断,1942年中国国际通道被日军封锁,原有侨汇网络已难以为继。东南亚和潮汕侨批业界极力摸索新汇路。泰国业者曾尝试由泰国北部清迈、清莱进入云南,再至潮汕地区,后因各种困难而作罢。<sup>⑤</sup>1942年,越南海防和祥庄批局代理人陈植芳开辟较安全可行的“东兴汇路”,<sup>⑥</sup>承担了非沦陷区主要的侨批寄递。不过,东兴汇路是特殊时期的侨汇线路,

东兴因侨汇盛极一时,是当时主要的中转局中心和金融中心,先后有数十家批信局设点,主要是潮汕批信局,另外也有越南和祥庄等、泰国南源局等,柬埔寨老奇香局等东南亚批信局。<sup>⑦</sup>另外,广东省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光裕银行等也先后设立办事处。侨汇主要来自泰国,另外还有印度支那。侨汇通过西堤线(西贡和堤岸)、金边线、老挝线、曼谷线各批

信局,把侨汇款越币(泰币也应事先换成越币)集中后,由各批信局派人到河内、海防与收汇商(中转站)结价,再由收汇商把款委托人带至芒街(后为东兴),然后交给驻东兴各批信局代理人,继而由东兴流入柳州、桂林,转汇潮汕地区。<sup>⑧</sup>东兴汇路路途远,风险高,时间长,全程一般需一个多月,有时需三个月,与以前侨批网络相差甚远,但因当时沿海国际通道完全隔绝,因而弥足珍贵。

## 五、侨批网络恢复与鼎盛时期 (1945—1948)

二战结束后,批信局大批复业,侨批网络迅速恢复。由于长期被隔绝的侨汇猛增,国内法币汇率波动频繁,侨汇投机盛行,侨批网络趋于鼎盛。

首先,批信局家数多。1946年,新加坡、巴达维亚、曼谷、马尼拉和西贡等东南亚各地共有571家。<sup>⑨</sup>据不完全统计,潮州帮经营侨批业务的商号总计有451家,其中新加坡80家,马来西亚103家,北婆罗洲22家,东婆罗洲(荷属)49家,苏门答腊29家,爪哇1家,法属安南29家,泰国118家。<sup>⑩</sup>从相关报刊中也可见当时之兴盛,如1945年泰国《中原报》刊出广告的批信局有30家,次年1至5月不少于56家。<sup>⑪</sup>新加坡地区,1947年在“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出版年刊”中刊登广告的潮汕帮批信局有52家。1948年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员名单中有65家经营福建侨汇,其中多数是批信局。

国内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潮汕属批信局有153家,其中香港有22家,<sup>⑫</sup>整个潮汕地区有131家,汕头市由抗战期间30多家增至73家,潮安6家,澄海13家,潮阳13家,揭阳10家,饶平9家,普宁5家,惠来1家,丰顺1家;<sup>⑬</sup>1948年,汕头市侨批业公会登记会员有68家批信局,而没有登记的尚有祥益、裕益等10多家,因而当时汕头市的批信局实际有80多家(有人确定为85家)。<sup>⑭</sup>福建有117家,其中厦门有63家,<sup>⑮</sup>其东南亚联号数量不详。

其次,业务极为繁荣,兼业批信局不断增多,金融投机盛行。为便于金融投机,批信局兼

营汇兑局、进出口业务或其他商业业务极普遍，如1948年厦门就有建南、中国、正大等13家批信局兼营汇兑业。<sup>④</sup>批信局在香港、上海等处设立机构，办理黑市套汇交易，承做同业侨汇头寸调拨，买卖期货汇单，进行金融投机，上海买卖外币、私套外汇为违法，而厦门绝对公开、自由，<sup>⑤</sup>广东批信局主要业务就是从事侨汇套利与投机。批信局从事侨汇投机的主要方法有：积压侨款，套取汇率差价；进行期货买卖投机；走私黄金、外币、货物，闽船常有“巨量黄金私运厦门流入黑市”，<sup>⑥</sup>把黄金换成美元利润可达二成；<sup>⑦</sup>套压侨款，炒买金钞商品，经营货币拆放。因此，“侨批业利润主要来源已由批佣收入变为掌握侨汇头寸”，<sup>⑧</sup>这也是战后批信局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侨批网络鼎盛时期的标志之一。

再次，“一条鞭”组织盛行。所谓“一条鞭”，即从侨汇收揽、寄递直至派送等过程一条龙服务。东南亚批信局为延长套用侨汇的时间，又不影响回文退寄速度，纷纷在国内和香港设立分号和代理机构，发展“一条鞭”机构。1948年间，厦门、泉州、涵江等处批信局约有三分之一为国外分支机构。原为承转侨汇的国内批信局也纷纷自立门户，一时头二盘局大量发展。另外，批信局普遍在侨汇集中区设立特约信差，日夜赶工，缩短解付过程，尽量不影响回文退寄速度，福建建南批信局甚至专机载运回信，与同业竞争。<sup>⑨</sup>

最后，国内外侨批业公会联系密切，这也是侨批网络鼎盛的标志之一。侨批网络虽为跨国网络，但区域特征也很明显，因此批信局内部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各地侨批业公会承担了协调重任。1945年，新马地区侨批业公会开始走向联合，新加坡各帮侨批业公会组成了联席会议，并成立临时办事处（设在侨通行）。1946年，包括闽侨、潮侨和琼侨等各帮汇兑公会的联合组织——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成立，并选举以林树彦为首的领导机构，负责侨批网络内部协调与外联工作，尤其是加强侨批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涉与往来。早在1945年，联席会议代表林树彦就为恳求汇率及侨汇恢复事宜拜谒英国军政当局。汇业总会成立后，林树彦以会长

身份，在1946年10月向当地外汇统治官和中国政府交涉，取消了“侨汇自由兑换限制令”等。<sup>⑩</sup>同时，侨汇业公会又是闽粤地区与东南亚批信局之间联系的最重要媒介。1946年，厦门华侨银业同业公会先后与新加坡闽侨汇兑公会商议，决定厦门所属批信局代理海外局的解付费是解付额的4%。1947年，随着国内物价上涨，厦门侨批业公会就增加信差工资一事几次去函与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协商，最后因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新加坡闽侨汇兑公会反对，国内批信局也提出不同意见，最后维持原来工资标准。<sup>⑪</sup>

## 六、侨批网络的消逝 (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

1949年初，国内战争形势日趋明朗，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恶性通货膨胀更趋恶化。10月，新中国政府在福建、广东解放后先后派人接收当地银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机构，行使中央银行和一般银行的双重职能。同时，新中国实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政策，侨汇先由国家银行经手，同时对现存批信局造册登记，限制其发展，同时严厉打击外汇黑市交易和套汇走私等漏洞，批信局从事侨汇投机几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对新生政权抱观望态度，影响了侨汇寄递，直接打击了侨批网络。另外，东南亚各国二战后先后独立，各国先后颁布政策强迫或鼓励华侨归化于当地，还采取民族主义经济政策，限制和取缔华侨汇款，迫使他们将资金留在当地，汇款日益困难。随着华侨逐渐认同于居住国，与祖籍地关系日益疏远，因而逐渐减少或停止汇款。

这一时期批信局数量不少，据1951年调查，厦门1950—1951年间申请登记的批信局有110余家，尚在经营的64家，国内联号68家，东南亚联号243家。<sup>⑫</sup>潮汕方面，在汕头邮电局登记的批信局有60家，下辖分号775家，其中内地427家，港澳及南洋地区348家。<sup>⑬</sup>然而，由于东南亚汇款逐渐减少，存在近一个世纪的侨批网络渐趋消逝。

## 七、结 语

总体而言，侨批跨国网络萌发于18世纪后

期和19世纪初期的水客行业。随着侨民和侨汇的增多,侨批网络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前形成,随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因日本先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遭受重挫。随着战争结束和国内金融投机的盛行,侨批跨国网络进入鼎盛期,极为繁荣。然而,鼎盛之下也酝酿了巨大危机,东南亚华侨或因政府强制,或因自身利益,逐渐认同于侨居地,同时当地政府纷纷限制或禁止华侨华人汇款回国,另外中国大陆则因政权更替和政策变更,侨批跨国网络趋于消逝,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sup>⑥</sup>然而,侨批跨国网络在近代经济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平均每年给闽粤两省送来数千万美元的侨汇,不仅维系和改善了侨乡地区数以百万计侨眷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 侨批俗称“番批”指华侨汇集成批寄回国内、以汇款为主的家族书信。闽南语称书信为“批”,潮州话的“批”则专指寄款信件,含多件汇集成批之意,相应的回信则称“回批”。批信局专门经营侨批的组织,其名称各异,如“侨批局”、“民信局”、“银信局”、“信局”、“汇兑信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庄”和“侨汇庄”等,较正式的称呼为“批信局”、“民信局”或“侨批局”。
- ② 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第55页;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87-88页。
- ③ 许云樵等《星马通鉴》,新加坡:新世界图书有限公司,1959年,第624页。
- ④ 18世纪末,印尼文献记载了很多水客侵吞银信之事。包乐史、吴凤斌《18世纪末巴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134页。
- ⑤ 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第54页。
- ⑥ 黄清海等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 ⑦ 杨建成《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8页。
- ⑧ 黄清海等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 ⑨ 杨建成《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8页。
- ⑩ 洪永洛《永春侨汇史略》,《永春文史资料》,1985年第1期,第40页。
- ⑪ 广东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184页。
- ⑫ 有关侨批业经营制度的论述,可参考拙文《近代批信局特色探源——以福建为例》,《福建论坛》,2005年第5期;《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⑬ 饶宗颐纂修《潮州志·实业志·商业》,汕头:艺文印书局,1949年,第73页。
- ⑭ 水客不仅对侨批网络形成非常重要,而且对跨国移民网络形成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郑一省:《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
- ⑮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汕头: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 ⑯ 闽东地区批信局和侨汇相对较少,侨批网络不典型,因而本文主要论述闽南地区。
- ⑰ 郑川《安海侨汇业的前前后后》,《安海乡土史话》,1957年,第1辑。
- ⑱ 乔显祖《厦门侨汇业》,《厦门文史资料》,出版时间不详,第5辑,第29页。
- ⑲ 寒潭《华侨民信局小史》,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一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第60页。
- ⑳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110页。
- ㉑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86页。
- ㉒ 广东侨批经营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特点,潮汕主要是批信局经营,而梅州等区主要由水客和现代银行经营,四邑、广肇地区则由金山庄、传统银号 and 现代银行等控制,海南地区也主要由批信局经营,但其数目少。虽然这些地区也存在侨批网络,但以批信局为构建基础的侨批网络特征并不典型,因此本文分析广东侨批网络时主要选取潮汕地区。
- ㉓ 杨群熙编《潮汕地区侨批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第84页。
- ㉔ 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第55页。

- ⑤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120页。
- ⑥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91、101-103、96页。
- ⑦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86页。
- ⑧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96、100页。
- ⑨(泰)洪林《泰国侨批史略》，《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 ⑩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96-132页。
- 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家抗战，大量汇款寄回祖国，促进了海外侨批业的繁荣发展，1938年之前，闽粤与东南亚各地侨批汇路基本畅通，侨批网络并未受到直接冲击。
- ⑫1935年福建省邮政局统计为174处(另加闽侯8家)与日本人1940年代的调查(185处，其中厦门153处，其他32处)有所差异。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9页。
- ⑬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汕头：艺苑出版社，2001年；《潮帮批信局》(续集)，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⑭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9页。
- ⑮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⑯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89页。
- ⑰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9页。
- ⑱西尊《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3卷第8期，第20页。
- ⑲(日)滨下武志著，王玉茹等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 ⑳(美)马汀·奇达夫、蔡文彬著，王凤彬等译《社会网络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 ㉑Sherrie E. Human, Keith G. Provan, Legitimacy Building In the Evolution of Small-firm Multilateral Network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ccess and Demis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0, Vol. 45, No. 2, pp. 327-365
- ㉒汕头金融编撰小组《汕头金融志》(初稿)，汕头：汕头金融编撰小组，1987年，第119页。
- ㉓(美)马汀·奇达夫、蔡文彬著，王凤彬等译《社会网络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 ㉔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20页。
- ㉕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
- ㉖赵元培《论侨汇》，《经济导报周刊》，1949年，第120期。
- ㉗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
- ㉘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 ㉙《闽行资料汇编》(上)，第451页。
- ㉚潮汕沦陷区也有侨批业，被日本占领军严密控制，侨汇均被台湾银行控制。
- ㉛王炜中等编著《潮汕侨批简史》，香港：公元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54页。
- ㉜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29-2-136(之二)。
- ㉝根据广东省档案馆档案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29-2-330, 331, 332, 333统计而得。
- 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藏，《汕头邮区辖下批信局一览表》(1943年)，29-2-369。
- ㉟王炜中等编著《潮汕侨批简史》，香港：公元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60页。
- ㊱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日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史》1991年第10辑。
- ㊲王炜中等编著《潮汕侨批简史》，香港：公元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60页。
- ㊳另有两条秘密通道之说，第一条为：越南芒街——广西东兴——合浦——广东遂溪——湛江——转汕头；第二条为越南芒街——广西东兴——钦州——广东韶关——兴宁——揭阳——汕头。二者区别有限，皆经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可以统称东兴汇路。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日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史》1991年第10辑。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汕头：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 ㊴西尊《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广东省银行月刊》

- 刊》第三卷第八期,广东省银行1947年,第20页。
- ⑥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汕头:艺文印书局,1949年,第76页;广东省集邮协会、汕头市集邮协会编《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133-136页。
- ⑦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洪林、黎道纲编《泰国侨批文化》,2006年,第174期。
- ⑧广东省集邮协会、汕头市集邮协会编《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133-136页。
- ⑨广东省汕头邮电局编《汕头邮电志》,汕头:广东省汕头邮电局,1989年,第50页;杨群熙编《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2004年,第156页;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
- ⑩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汕头文史》,1995年,第13辑。
- ⑪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1页。
- ⑫黄清海等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 ⑬陈达士《厦门金沙市场近况》,《经济导报周刊》,1947年,第6卷第23期。
- ⑭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省政府秘书处档案,1-6-3123。
- ⑮(厦门)《江声报》,1948年7月16日。
- ⑯黄清海等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 ⑰黄清海等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 ⑱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柯木林、林孝胜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第171-179页。
- ⑲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年。
- ⑳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26页。
- ㉑广东省汕头邮电局编《汕头邮电志》,汕头:广东省汕头邮电局,1989年,第20-23页;杨群熙编《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2004年,第154页。
- ㉒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汕头:汕头艺文印务局,1949年,第72页。